

# 英语语用能力调查及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浙江师范大学 洪 岗

## 1. 引言

从本世纪初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普遍语言学教程》的问世到50年代号称乔姆斯基“革命”的代表作《句法结构》的出版,以及以后的十几年里,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一直是语言系统本身而不是语言运用。受语言学理论影响的外语教学的重点也很自然地落在教授语言系统知识——即语音、语法、词汇上,而不是放在教授语言运用上。学生在学习及跨文化交际中的失误也常常归咎于缺乏足够的语言系统知识,因此,这些失误往往当作语法错误来对待。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语言学的研究结果表明,世界上的语言虽然其系统不尽一致,但它们都能表达大致相同的言语功能。弗雷泽(Fraser)、林特尔(Rintell)和沃特(Walter)1980年指出,各种不同语言的使用者都能用他所使用的语言来表达一些相同的基本言语行为,如:请求、道歉、陈述、承诺等等。著名比较语言学家詹姆斯(James)1980年在其《比较语言学》一书中也指出:所有文化及它们代表的语言所用的那套言语行为基本相同。因此,在外语教学界常常有这样一种错误的观点,即一个学习外语的人只要学好语言系统的知识——语音、语法、词汇知识,就能在跨文化交际中有效地使用该语言并使交际获得成功。一个人的外语语言系统知识越好,他在跨文化交际中就越易获得成功。因此,外语教学就意味着教授语言系统的知识。正如威多逊(Widdowson,1979)描述的那样:“一个很普遍的观点似乎是这样:如果你教了语

言系统,语言运用便自然而然地就会了。比如说,你教了陈述句的构成,那么,学生就很自然地能下定义、作解释,进行分类、说明、描述、汇报等。总之,能够完成各种修辞行为(rhetorical acts),并且能够毫无困难地理解别人的修辞行为。”正是由于这种观点的影响,我国外语教学界一直强调对语言系统的教学,而对语言运用的教学重视还不够。1972年美国著名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Hymes)发表了“论交际能力”一文后,人们开始注意语言的运用方面。外语教学界也开始重视交际能力的培养。但是,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无论是在外贸还是旅游业,中英交际都出现不少故障,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解甚至冲突。最近几年跨文化交际,英汉语用差异这些课题在我国已引起重视,也已有一些成果先后问世,如胡文仲(1985,1988,1990),邓炎昌、刘润清(1989),何自然、阎庄(1986),王得杏(1990)等,但对具有不同语言能力的学生的语用能力进行测试、比较,借以剖析外语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的文章却很少,对语言能力与语用能力关系的探讨则更少,本文通过语用能力的调查,针对这些问题作一论述。

## 2. 语用能力调查

本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语言能力强的学生语用能力是否就一定强,也就是说语言能力与语用能力是

\* 本文是硕士论文的一部分,原稿用英文写成,曾由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何兆熊教授审阅。文中的调查曾得到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华钧副教授的指导和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二系 Betty Barr 女士的帮助,在此谨表感谢。

否完全成正比;2)语言系统的知识一旦教会,语言是否自然而然地会运用;3)中国学生的语用失误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通过这些分析,来剖析我国外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 2.1 调查方法

进行语用调查,收集语料很重要,这关系到调查结果是否可信。收集语料的方法很多,但一般认为最好的是观察法,即用录音将双方的对话录下,然后根据这些录音进行整理,选取所需材料再进行分析。这一方法被许多语言学家,社会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所采用,美国著名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Labov)60年代在纽约百货公司做的调查就是用这种方法。但是,要用这种办法在中国收集到调查所需的足够的跨文化交际的语料,会受到许多限制。首先,话题、说话者与受话者的关系、谈话双方的性别、年龄等因素对说话者选用何种语言形式起着重要作用,这样调查者就很难确定究竟是哪一种因素使说话者采用某一特定的语言形式。其次,英语在中国是外语,不是第二语言,因此,很难收集到足够的真实材料,这样,调查的质量就无法保证。因此,本文采用答卷法,而非观察法,即以试卷的形式,根据真实情况,给受试者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有情景说明,学生根据这些情景选择恰当的语言形式作答。用这种方法,调查者既可将问题限制在所需的范围内,又可以把影响说话者的因素加以控制,可提高准确率,节省时间,也易于操作。

### 2.2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的对象是某省重点师大外语系本科英语专业两个年级4个班的94名学生。其中一年级50名,四年级44名。该校外语系学生是全国高考第二批录取的,同普通高校一起录取,因此,他们比较具有代表性。另外,这些学生都是经过中学5至6年的正规教育,都通过了全国统一高考,也就是说他们都具有一定的语言能力。我们有意选一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是因为我们想知道语言能

力更强的四年级学生的语用能力是否比一年级的学生强,语言能力强的人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是否就少。

### 2.3 问卷的形式、内容及问题来源

此调查的问卷采用两种题型,一种是多项选择题;另一种是判断题,即要求被调查者判断某一话语在某一特定语境中是否合适。此题共50题,分两大类,一类是社交语用问题(sociopragmatic questions),共30题,另一类是语言语用问题(pragmalinguistic questions),共20题,每题都有一小段文字用来描述话语所出现的语境。语言语用题主要测试两方面能力,一是对某一语言形式所显示的语用含义的理解和运用的能力;二是在特定语境里准确表达自己用意或准确理解他人用意的能力。社交语用问题主要测试学生另一种能力,就是根据以不同文化为背景的语言交际者的语言习惯和特点,在各种不同的社交场合使用得体的、合适的语言形式的能力。这种语言形式虽有可能与受话者母语的语用形式相同或相近,但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他们的语用功能与受话者母语的语用功能相差甚远。当然,以上两类问题的划分也不总是一目了然的。另外,社交语用问题有时也可看作是社会语言学问题,两者很难划一条绝对分明的界线。正如莱文森(Levinson)1983年在《语用学》一书中说的,“要对社会语言学与语用现象划一条界线似乎是件异常困难的事”。然而,区分这两种问题对外语教学来说并不重要。

问卷中的问题是根据中国学生使用英语的情况,结合笔者平时教学中发现的问题,参考以下几方面的材料编写而成的。这些材料包括1)在中国工作多年并经常与中国学生接触的外籍教师所提供的他们平时所觉察到的中英文化差异;2)国外学者经过调查发现的非英语国家的英语学习者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3)《超越语言: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跨文化交际》一书中的文化差异问题以

及文化注释;4)《中国学生在英语交际中的语用失误——汉英语用差异》一文以及《语用学概论》一书的有关章节。

#### 2.4. 答卷要求

本调查在四个教室同时进行,问卷发给 学生之前,监考人向学生说明以下几点:1)此调查是对他们的语用能力进行测试;2)此卷要求学生独立完成;3)在答卷时学生如果在理解卷面上的问题有语言困难,对某一词或某一短语的意思不清楚,可以问监考老师,也可以查字典;4)学生答卷的时间不受限制。这样学生在答卷时就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语用方面,而不是集中在语法上。同时可以避免由于语言理解上的困难或由于时间不够而引起的语用失误。另外,学生做此卷实际所花的时间由监考人作记录。

#### 2.5. 答卷统计方法及结果

为了了解四年级学生答卷的总成绩是否比一年级学生好,语言语用能力和社交语用

能力是否比一年级好,对一年级和四年级学生的失误总率,语言语用失误率和社交语用失误率分别作出统计。为了了解哪类问题对具有相当语言能力的中国学生最为困难,我们对每一问题失误的人数加以统计。另外,我们对一年级和四年级学生答卷所需的时间也进行比较。

大多数一年级学生用了 50 分钟完成答卷,而大多数四年级学生花了大约 40 分钟,从时间上看四年级学生少用了 10 分钟左右。

50 个问题一年级学生的平均失误为 23.38 个,占总数的 46.76%;四年级学生的平均失误为 23.30 个,占总数的 46.6%。20 个语言语用问题,一年级和四年级学生的平均失误分别为 10.48 个和 10.57 个,分别占总数的 52.5% 和 52.85%。30 个社交语用问题,一年级和四年级的平均失误分别为 12.90 和 12.73 个,分别占总数的 42.96% 和 42.39%。为了对比的方便,统计结果列表如下:

每一学生的 平均失误率 学生类别	失误率类别 (总数)	总平均失误率 (50)	语言语用失误率 (20)	社交语用失误率 (30)
一年级学生		46.76% (23.38)	52.50% (10.48)	42.96% (12.90)
四年级学生		46.6% (23.30)	52.85% (10.57)	42.39% (12.73)

从上表可以看出一年级和四年级学生的语用能力相差甚微,两个年级的平均失误率仅差 0.16%。此外,一年级学生的语言语用能力略强于四年级学生;而四年级的社交语用能力略强于一年级学生。当然,这一结果并非决定性的,因为影响测试的因素很多。如:试卷中的问题不可能包括所有语言语用问题和社交语用问题,因此,本测卷成绩差的学生在另一类似的调查中也许会做得稍好一些。但是,任何测试都无法避免这些因素。

#### 2.6. 调查结果说明的问题

虽然此结果并非决定性的,但它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一些问题。首先,语言能力

较强的四年级学生的语用失误与语言能力相对较弱的一年级学生的语用失误相差甚微,说明语言能力强的人,语用能力并不一定强,即语言能力与语用能力并非完全成正比。

调查结果同时否定了“只要教语言系统知识,语言运用便自然而然地会了”这一观点。中、英两种语言所能表达的言语功能虽然大致相同,但是,这并不等于学会了英语语音、语法、词汇的知识,就能准确地表达和理解英语的言语功能。如:中英两种语言都有表达请求、允许等功能。在我国一般的英语初级教程中就有“Can you...”或“May I...”的句型,但是,不管是大学英语专业的一年级,还

是四年级学生,在特定语境里理解用上述句型表达的言语功能都有一定困难。问卷中有两题涉及到“May I...”这一语言形式。一题是这样的: B站在路中间,挡住了A的道, A对B说“May I get through here?”另一题是在餐桌上A对B说“May I have the biscuits?”这两题形式上是问句,但实际上都是表示“请求”这一言语功能。94名学生中就分别有55名和62名学生把这两题错误地理解成“征询许可”的问句。另外,象“It doesn't matter.”“I'm sorry.”“Never mind.”“That's all right.”等惯用语在我国使用的英语初级教科书中就出现,但大学本科英语专业的学生,甚至有的教师还是不能准确地使用这些惯用语。本调查有这样一道题:一天一位美国小姐不慎踩了一位中国青年的脚,她向这位中国青年道歉说“I'm terribly sorry.”要求学生选择一个答案对美国小姐作出回答,94名学生中就有75名选“It doesn't matter.”来作答,而选用正确答案“That's all right.”来作答的学生仅有两名。由此可见教外语不但要教语言系统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教语言运用的知识。

调查结果表明,学生在言语语用问题中失误最多的是一些惯用语的用法。特别是那些在中、英两种语言中都存在且字面意义大致相同的惯用语。如中文的“没关系”与英文的“Never mind”的字面意思大致相同,但是它们的使用场合以及表达的语用功能却不完全相同。中文的“没关系”既可用于对“致谢”作答,也可用于“道歉”作答,而英文的“Never mind”却只能用于对“道歉”作答。

社交语用方面失误较多的是那些由于两种文化背景不同,在一种文化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在另一种文化中却被认为是很不合适的。如中文在会议通知的最后写上一句类似“请按时到会”或“请准时参加”之类的话是很普通的,也是很合适的;但是,如果在英文的通知后写上“Be on time”这类的

话,英美人就认为是很不合适的,因为类似这样的话意味着那些被通知到会的人总是迟到,因此,写通知时总是要提醒他们准时参加。此调查中就有一题叫学生判断在英文会议通知后写上“Be on time”是否合适,结果94名学生中有64名认为是合适的。由此可见在外语教学中不可忽视这方面的教学。

### 3. 调查结果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调查结果表明语言能力强的人,语用能力不一定就强,即有很好的语音、语法、语汇的知识,不一定能在跨文化交际中取得成功,也就是说语言能力与语用能力不完全成正比;学了语言知识,语言运用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就会,非西方文化国家的人尤其如此,也就是说语言能力并不等于语用能力。调查结果还表明,各种语言所能表示的言语功能大致相同,并不等于某种语言的言语功能就可以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去,正如语法一样,各种语言的语法规则大致相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学外语时,就可以不学语法了。

由此可见,语用能力必须与语言能力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语法错误和语用失误都会使交际失败,但“语法错误从表层结构上就能看出,受话者很容易发现这种错误。这种错误一旦发现,受话便会认为说话者缺乏足够的语言知识,因此可以谅解。语用失误却不会象语法错误一样看待。如果一个能说一口流利外语的人出现语用失误,他很可能会被认作缺乏礼貌或不友好。他在交际中的失误便不会归咎于语言能力的缺乏,而会归咎于他的粗鲁或敌意”(Thomas, 1983: 96—97)。因此,外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教授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 特定的习俗化的语言形式,如“I'm sorry”, “Excuse me”, “Never mind”, “It doesn't matter”等等,以及它们所使用的特定语境;

2) 中英实现言语行为和理解言语行为的差异;

3) 英语中的禁忌话题以及有损听话者面子的言语行为;

4) 中英文化间谈话双方的主从地位或谈话双方的社会距离的差异;

5) 中英文化价值观念和语用原则上的差异。

在外语教学中应该避免的一种倾向是:先教语言知识,然后再教语言运用,也就是先让学生过语言关,再教学生如何运用不同的语言形式。这种方法就好像做黄油面包一样,先把面包做好,再涂上黄油,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其结果势必使学生套用母语言语功能的规则,从而把语言形式运用到不恰当的语境中,使交际失败。

另外,一年级与四年级的语用能力相差甚微,这一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在英语教学中对语用能力的培养还欠重视,或者是教师在培养语用能力时使用的方法欠妥当。要培养学生的语用能力,教师首先应尽力提高自己的双重文化的能力,尽管这并不十分容易,但对外语教师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另外,教师在讲课时只对语言形式及其字面意思作出解释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对语言形式的不同语用功能及其使用语境作出充分的解释,并且尽可能在课堂上创造一些模拟真实语境,让学生使用这些语言形式,如扮演角色等课堂活动。在教授惯用语时不应强调学生背诵,更重要的是要求学生把外语中的惯用语与汉语中的相应惯用语进行比较,然后再进行解释并区别其使用场合。在教授目的语国家文化时,教师不应只用讲解的办法,而应组织学生进行讨论,让学生进行中外文化差异的对比,通过对比,学生才能真正了解这些差异,使用语言时对文化的敏感性才会真正提高。也只有这样,学生的语用能力才能得到培养,才能在跨文化交际中取得成功。

#### 参考书目

- Chomsky, A. N. 1957. *Syntactic Structures* (Janua Linguarum, series minor, 4), Mouton (The Hague).
- Chomsky, A. N. 1965.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MIT Press.
- Fraser, B., E. Rintell, and J. Walters. 1980. An approach to conducting research on the acquisition of pragmatic competence in a second language. In D. Larsen-Freeman (ed.), *Discourse Analysis* (75-81). Rowley, Mass: Newbury House.
- Hymes, D. H. 1979.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C. J. Brumfit and K. Johnson (eds.),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Teaching* (5-26). Oxford: OUP.
- Labov, W. 1966.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 Leech, G. N.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don: Longman.
- Levine, D. R. and B. A. Mora. 1982. *Beyond Language: Inter-culture Communication for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 Levinson, S. C. 1983. *Pragmatics*. Cambridge: CUP.
- Thomas, J. 1983. Cross-culture pragmatic failure. *Applied Linguistics* 4/2: 91-109.
- Widdowson, H. G. 1979. *Exploration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Oxford: OUP.
- Yorjo, C. A. 1980. Conventionalized form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TESOL Quarterly* 14/4: 433-442.
- 何兆熊, 1989, 《语用学概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何自然, 1986, 中国学生在英语交际中的语用失误——汉英语用差异调查。《外语教学与研究》67/3: 52—57。
- 何自然, 1989, 《语用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
- 索绪尔, 1982 (1949), 《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王得杏, 1990, 跨文化交际的语用问题。《外语教学与研究》84/4: 7—11。
- 收稿日期: 1991. 6. 9; 本刊修订稿, 1991. 7. 19。  
通讯地址: 321004 浙江师范大学外语系